

地方政协全会聚焦的教育热点

让更多家庭婴幼儿“托得起、托得好”

——北京市政协委员建言托育服务体系

本报融媒体记者 谢阿慈 李京 张佳琪 马嘉悦 康亮 王星星 袁世鼎 赖仁杰

幼有所育,事关千家万户。近年来,随着国家二孩、三孩生育政策的实施,“生了娃没人带”“双职工带娃难”成为很多年轻父母生育路上的一大难题。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我国有超过三成的婴幼儿家庭有托育需求,社区就近托育服务的市场需求十分旺盛,但入托率仅为5.5%左右。

2024年北京市政府“重点任务清单”指出,北京今年将完善生育支持政策,加快普惠托育体系建设,新增普惠托位1万个,免费为普惠托育机构提供安全运营保险,建设母婴友好医院15家。如何让更多家庭婴幼儿享受“托得起、托得好”的托育服务?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期间,多位政协委员就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建言献策。

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托育服务体系

做好托育工作,对于激发“生”的意愿、解决“育”的难题和减轻“养”的负担,具有重要作用。

“政府是顶层设计的谋划者、组织者和推动者,推进托育服务体系,完善的顶层设计是重要前提。”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吴彬认为,2023年北京市政府发布了《北京市托育服务体系三年行动方案(2023—2025年)》,明确了未来三年托育服务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和举措,但还不够。还应进一步强化政府主导作用,推动托育服务相关法规、政策和制度创新,实现托育资源的均衡布局、有效供给和精准匹配,推动托育服务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吴彬建议,在国家层面,应尽快将托育

服务列入“需要抓紧工作、条件成熟时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在地方层面,2023年1月,《上海市学前教育与托育服务条例》实施;今年1月23日,《武汉市托育服务促进条例(草案)》已列入立法程序。北京市也应加快托育服务立法,为完善托育服务体系提供有力支撑。

北京市政协委员,非物质文化遗产何氏通络开结术代表性传承人何银萍建议,要建立完善托育服务有效支撑体系,制定与城市发展和人口布局相适应的托育服务发展规划,完善托育服务标准和规范,进一步明确各类托育机构设置、审批、备案、管理、监管的部门具体职责和相关程序。

“医育融合托育服务模式可将医疗、教育、保育等多种服务融合在一起,为婴幼儿提供科学、专业的综合性服务,这种模式可以满足儿童和家庭的多元需求。”在北京市政协委员,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呼吸内科副主任朱春梅看来,医育融合已成为当今医疗和教育领域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托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方向和发展目标。

朱春梅表示,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对婴幼儿医育融合服务的发展方向、管理方式、服务内容等方面进行规定和指导。同时,加大政策宣传和解读,让更多家庭了解托育服务政策和科学育儿的理念,提高家庭对托育服务的认知和信任度,从而提升入托意愿。

鼓励单位办托,推动托育机构多元化发展

“要让更多有志于提供托育服务的单位、机构和社会力量顺畅介入,才能释放更多托育需求。”北京市政协委员,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赵丽君表示,单位办托作为一项福利,可为职工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接受、

托育时间与职工工作时间无缝对接、方便可及的普惠托育服务,应积极推进用人单位办托。

“普惠价格低于市场价格,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职工0—3岁婴幼儿入托难、入托贵难题。”赵丽君介绍,近年来,北京市总工会积极与政府相关部门形成联动,加强顶层设计,提出了在有条件的机关、企事业单位、园区、楼宇、街道、社区等用人单位因地制宜,通过挖掘自身幼儿园潜力,实施托幼一体化;鼓励单独建设或联合建设,自行运营或引入第三方托育机构服务等多元发展的托育服务运行模式。目前,北京市用人单位办托班24家,提供托位1055个,实际入托人数579人。

“既要推进普惠资源扩容增效,还要多渠道扩大社会托育托管资源供给。”何银萍进一步表示,应当对公办托育机构建设进行科学测算和按需规划,完善公建民营机制,综合“从业信誉、服务水平、可持续性”等质量指标,引进托育运营机构早期介入、全程参与项目建设,探索开展连锁化运营。同时,依托政府机构网络,充分发挥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功能,通过场地和硬件支持、购买服务等,支持专业服务机构依托社区加强网点建设,提供就近的全托、上门、短时托管、突发情况救护等多元化服务。

赵丽君通过调研发现,资金短缺是用人单位办托可持续性发展的最大瓶颈。“单位办托经费主要来源于行政经费和工会经费支出,工会经费的服务对象是全体工会会员,拿出大额资金支持托育园运营终究‘压力山大’。”

难题怎么解?赵丽君建议,将用人单位办托纳入全市普惠托育服务工作总体规划,统筹运用现有财政资金,建立专项资金保障,可借鉴公立幼儿园开办费补贴模式,为用人单位新建托育园所给予一次性开办费补贴。

“既要推进普惠资源扩容增效,还要多渠道扩大社会托育托管资源供给。”何银萍进一步表示,应当对公办托育机构建设进行科学测算和按需规划,完善公建民营机制,综合“从业信誉、服务水平、可持续性”等质量指标,引进托育运营机构早期介入、全程参与项目建设,探索开展连锁化运营。同时,依托政府机构网络,充分发挥城乡社区公共服务设施的婴幼儿照护服务功能,通过场地和硬件支持、购买服务等,支持专业服务机构依托社区加强网点建设,提供就近的全托、上门、短时托管、突发情况救护等多元化服务。

加强技能培养,提供人才支撑

近年来,随着社会对婴幼儿托育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托育行业的发展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其中,托育人才短缺问题尤为突出。

针对托育服务技能人才缺乏的问题,何银萍建议,可以通过将托育人员作为急需紧缺人才纳入培养目录,引导职业院校、高等院校增设婴幼儿照护服务相关专业等方式,扩大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学历托育人员招生规模。

“全市7所本科高校设置学前教育专业。职业院校中,14所设有托育专业,22所设有幼儿保育专业,13所设有学前教育。”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青年政治学院党委副书记、院长乔东亮表示,目前托育专业多为中职高职院校在培养,学生报考意愿低,毕业后的晋升和发展方向也比较模糊。他直言,全国范围内托育人才缺口高达数十万人。托育人才数量少,素质也参差不齐。不少托育人员经过简单培训后就上岗,缺乏专业素养,无法满足当前社会的托育需求。

针对这些问题,乔东亮建议要从高校端、社会端、机构端分别出力。具体来说,高校端要增学位、通学历、强课程。增设专业,减免托育专业学生学费,贯通升本升硕通道,建立中高职本一体化、托幼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统筹设计课程体系;社会端要扩队伍、促晋升、提待遇。要将全职妈妈、银龄老人纳入托育人才队伍,建立托育人才职称评审机制,合理设置初、中、高级职称,提高托育从业人员待遇,增强托育工作吸引力;机构端要明确标准、严准入、强培训。要结合托育工作实际,制定出台人才选用标准。托育机构要严格选人用人育人。同时,制定托育服务人员培训机制,制定托育人员在岗培训办法,规范职后培训。

在朱春梅看来,完善医育融合人才培养体系与加强医育融合培训及监管同样重要。她进一步建议,加强医育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设计,加强妇幼保健、疾病预防、卫生监督等机构对托育机构的业务指导和监督检查等。“总之,强化人才培养是重中之重,没有人才,犹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未来,需要综合施策,加快完善托育服务体系,让年轻育龄夫妇不仅生得起,还要养得起、育得好。”



奥运冠军开课啦!

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两周年到来之际,日前,一剂特殊的“奥运冠军课堂”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广宁街道“十美广宁欢乐冰雪季”的冰场开讲,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女子短道速滑3000米接力冠军、冬奥社区第四任轮值社区区长张会在现场教授辖区小学生如何掌握基本的滑冰技巧。活动旨在继续弘扬北京冬奥精神、传播冬奥文化,在后奥运时代继续带动全民运动、全民健身,鼓励民众热爱体育运动。

本报记者 贾宁 摄

■ 议政·参考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2023年5月2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增强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要根据国际形势发展变化,完善教育对外开放战略策略,统筹做好‘引进来’和‘走出去’两篇文章,有效利用世界一流教育资源和创新要素,使我国成为具有强大影响力的世界重要教育中心。”这为我国教育对外开放及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政策性极强的一种涉外办学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定位必须符合国家和改革发展的全局,必须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推动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必须有明确的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界限。在现实生活中,对中外合作办学知之不多者有之,故意混淆中外合作办学政策界限者亦有之;由于外方高校对我国中外合作办学相关法规政策了解不够、信息不对称,导致有些高校在和外方洽谈合作时,出现谈判合作不成或草签办学协议和(机构)章程等问题,使“引进境外优质教育资源”成为“空谈”。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实施办法规定:中外合作办学是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的教育机构或项目的活动。中外合作办学分机构和项目两种形式。中外合作办学是一项行政审批事项。未经审批机关依法批准取得《办学许可证》或《项目办学批准书》的涉外办学活动,都不属于中外合作办学。围绕中外合作办学有以下几点必须明确:

第一,中外合作办学的主体是中国教育机构和外国教育机构,缺一不可;中外双方教育机构都必须具有法人资格。需要对外国教育机构是否具有法人资格加以细致考证;必要时,应寻求我国驻外使领馆教育处(组)的协助。值得特别强调的是,外国宗教组织、机构、院校不得和我国开展中外合作办学。中外合作办学不得举办实施义务教育、军事、警察、政治等特殊性质教育的机构。中外合作办学必须贯彻中国的教育方针。

第二,中外合作办学的重点是中外教育机构的“合作”,其核心是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开宗明义:“国家对中外合作办学实行扩大开放、规范办学、依法管理、促进发展的方针。国家鼓励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中外合作办学。”也就是说,中外合作办学双方必须在办学条件、教育教学、管理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实质性合作,包括共同制定培养方案,根据相关政策文件规定引进优质课程、教材和师资。合作过程中双方要加大改革力度,杜绝课程、教材把关不严;师资质量差;第三方参与把中外合作办学当“摇钱树”现象的发生。

第三,中外合作办学以中国公民为主要招生对象。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虽允许招收外国留学生,如上海纽约大学的外国留学生比例较高,这对于提升学校的国际影响力也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须明确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的学生主体是中国公民。

中外合作办学丰富了我国的教育资源供给,满足了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教育需求。2022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中,也明确提出要开展高水平中外合作办学。同时,中外合作办学加快了我国教育国际化的进程。它让许多学生不出国就能体验国际环境,享受国际资源。既节省了学生出国学习的消费开支,也节省了国家的外汇支出。

中外合作办学为国家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有创新力的国际化人才。据不完全统计,中外合作办学目前在在校生规模超60万人,已毕业学生超过200万人。这些毕业生往往因接触更多元的环境,而具有开放思维、包容心态,跨文化沟通能力强,因此在就业市场中具有独特优势。他们不仅有着较高的就业率,而且就业质量也在逐年上升。

中外合作办学促进了高校的体制机制改革。中外合作办学有效地引入国外优质的教育资源,包括教育教学理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评价体系等,从而也有力地推动了国内高等教育的发展。同时,中外合作办学还推动了国际化、高水平的师资队伍队伍建设。

因此,必须看到,过去四十多年来,中外合作办学在社会多方面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外合作办学更是取得了一系列历史性成就,其丰富教育资源供给、高质量人才培养、开展教育机制改革等方面发挥的独特作用值得继续深入挖掘。而若想持续发挥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明确中外合作办学的界限是基础,也是前提。

(作者单位:浙江外国语学院西语学院)

推动中外合作办学高质量发展

甘甜

到2025年,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缺口将达3000万人

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委员建议:职业教育要实现高质量发展

张倩 本报记者 范文杰

据教育部统计,2024届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179万人,同比增加21万人。另据人社部统计,2022年中国技能人才仅占就业人口总数的26%,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28%。数据显示,预计到2025年,仅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技能人才缺口将达到近3000万人。毕业生找不到工作,企业招不到人才,成为当下就业市场普遍存在的问题。

近日,本科生“回炉”职业院校的新闻不绝于耳,引起多方关注。其实,早在2015年,就有高校毕业的本科生去职业院校学技术;2021年,一段多名中年人出现在山东一所高职院校新生报到现场的视频引发热议。随着就业形势日益严峻以及职场竞争日趋激烈,本科生“回炉”读职校的报道不绝于耳,折射出社会对高质量技能人才的需求日益迫切,提升职教层次迫在眉睫。

在刚刚召开的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上,多位自治区政协委员及专委会围绕职业教育发展提出建议。

自治区政协委员贾毅介绍,宁夏共有职业院校41所、在校学生15.66万人。专

大学校园开放难在哪儿?北京市政协委员刘郁有话说

岁末年初,以清华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官宣进一步“开园”,高校管理问题再一次走进大众视野。

北京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召开期间,北京市政协委员、民建北京市委企业营企业委副主任刘郁呼吁:“高校不应该成为一个封闭空间,它具备的公共资源属性和社会服务职责不能脱离社会而存在。应该优化校园管理,推动校园有序开放。”

平时工作、生活在昌平大学城附近,刘郁有着切身感受。“我经常到大学进行调研交流。高校不封闭,能够让更多的科研机构和师生流动起来,学生们也能有更广泛的活动空间。”他表示,高校有着丰富的学术资源和深厚的文化底蕴,在服务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体现地区乃至国家精神文化风貌方面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社会人走进大学,也能感受其中的

文化氛围和学术气息。”

针对目前部分高校因环境秩序、安全隐患等问题而“不愿开放”“不敢开放”,开放校园的部分在校生抱怨游客乱丢垃圾、大声喧哗等情况,刘郁建议“多管齐下”,扭转尴尬局面。

高校最基本的职责为教书育人,这决定了高校的开放不能影响正常教学活动。他建议,高校进一步提高管理水平,推出更精细、更具弹性的规定,通过各种智能化手段,对学校内各处设施承载力水平、正常教学活动所需设施等情况统筹考虑,科学合理制定开放政策,使校园开放和内部管理达到平衡。

刘郁直言,高校开放中难免出现校园内人员混杂等情况,增加了不稳定性因素。为了最大程度保障校内师生安全,在制定开放规则时应充分征求公众和师生的意见,通过实

厦门市政协委员热议:这些「教育的事」得办好

本报记者 照宁

在今年厦门市“两会”期间,不少政协委员对青少年心理和身体健康成长、美育体育质量提升等教育热点问题建言献策,为厦门建设现代化教育强市、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凝聚智力。

“近年来,有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的中小学生数量增多,自伤、自残等极端行为频发,且有向低龄蔓延的趋势,已经到了令人担忧的地步。”长期从事教育工作的市政协委员认为,做好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亟须加快构建中小

学生心理健康协同育人机制。她建议,成立由教育局、街道、卫健委、民政局等部门组成的心理健康工作领导小组;组建专业化的心理健康研究团队,对心理健康测评与危机评估技术研发、心理状态数据库与监测预警系统研制等重大问题,展开深入调研和可行性论证;定期组织学生开展心理健康筛查,建立中小学生心理疾病诊断机制和多部门联合干预、康复机制;探索社会专业心理咨询机构辅助学校进行心理健康日常管理。

“‘双减’政策落地实施后各学校都开展了课后延时服务,但受师资及硬件等因素限制,音乐、绘画、体育、舞蹈等多元化服务不能全面开展,课后延时实际上变成了老师‘看管’。”而加强美育教育,以文化润泽心灵是新时代育人的“刚需”,为此,庄德义委员提出,将课后延时的时间充分利用起来,让社会美育机构充分参与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由第三方监督机构介入,校外服务机构接受监督,逐步扩大校内课后服务规模和收费问题;明确校外机构进入及退出机制,规避课后延时服务的乱象。

“体质健康管理评价已经纳入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综合评价体系,但因体育锻炼场地局限、延时服务时间冗长等问题,目前我市中小学生的体育锻炼时间未得到有效保证,体育课和课外锻炼的质量需进一步提高。”民进界别的委员们结合前期的调研提出,人工智能赋能学生体育锻炼是新趋势,建议校园引进AI技术辅助学生锻炼。具体可以在学校公共区域设立AI运动设备,通过个人或者班级积分排名方式,鼓励学生利用课余时间或者延时时间踊跃参与运动打卡活动。政府主导开发适合学校的多人体感项目,扩大AI课程应用覆盖面,以游戏形式吸引学生积极锻炼。在体育课程中增加AI运动项目,实现体育课堂精准化教学,强化学生体能。开发课后自主学习教学,激发学生积极性,让学生可以在“小空间”得到“大运动”。